

2019 年 11 月
第 51 卷第 6 期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Nov., 2019
Vol.51 No.6

论中国农业遗产的生态智慧 ——以梯田为例^{*}

彭兆荣

(四川美术学院 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 四川 成都 401331; 厦门大学 人类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中国的农业是生态智慧的典范, 在当今世界遗产事业中, 虽有“重要农业遗产”之项目、名目, 却未能完整地反映我国农耕文明之特色, 需特别强调“并作”保护与存续。梯田是我国南方重要的农业遗产, 反映了生态链的整体性和主体性, 其中“水土”成其关键。“水”的作用远非仅仅是灌溉, 它还具有政治性, 就像当代的世界遗产一样, 需全面认识我国农业遗产之多重价值。

[关键词] 农业遗产; 梯田; 水土; 沟洫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10(2019)06-0055-08

引 言

“农业遗产”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 说“久”, 是我国的农耕文明悠久; 说“新”, 是指“遗产”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是世界遗产事业的产物。^① 我国近 10 年来对农业遗产的研究出现了升温的态势, 对一些相关重要话题进行了论述和讨论。在农业遗产研究的理念原则方面, 李根蟠认为, 以“古今中外法”为基本的研究范式。^② 在概念方面, 闵庆文认为, 中国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指中国人民在与所处环境长期协同发展中世代传承并具有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完善的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独特的生态与文化景观的农业生产系统。^③ 对农业遗产的保护方面, 苑利提出从传统农业耕作技术与经验、生产工具、生产制度、传统农耕信仰、民间文学艺术、当地特有农作物品种等方面实施有效、综合保护, 提出了更为具体的三种保护方式, 即原地(in-situ)保护, 基于社区(community-based)保护和动态与静态结合(dynamic & static)保护。^④ 在农业遗产的分类方面, 王思明将中国的农业文化遗产扩展为十大类: 农业物种、农业遗产、农业技术方法、农业工具与器械、农业工程、农业聚落、农业景观、农业特产、农业文献、农业制度与民俗文化。^⑤ 此外, 对于农业法缺失的提醒以及法理关系的配置、传统农学的知识谱系研究、旅游与农业发展的关系等多面向、多学科、跨学科的整体研究, 文献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等, 学界都有涉及, 此不赘。窃以为, 中国的农业不仅体量巨大, 名目繁多, 内涵深刻, 形态多样, 而且在知识、经验、技艺, 尤其是生态智慧等方面独树一帜, 值得进行更加深入的创新型研究。

一、农业遗产

笔者以为, 以遗产之类型相对应, 中国最大宗、最有代表性的遗产不是长城, 不是故宫, 是农业遗产。道理很简单, 中国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之名实标榜于世的社稷国家。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代表曾称之

* [作者简介] 彭兆荣, 男, 江西泰和人, 四川美术学院首席专家, 厦门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文学人类学。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类)重点项目“中国特色艺术学体系研究”(17AA001)。

- ① 彭兆荣. 遗产: 反思与阐释[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8: 2.
- ② 李根蟠. “古今中外法”与农业遗产研究杂谈[J]. 中国农史, 2013, (1).
- ③ 闵庆文, 张碧天. 中国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研究进展[J]. 农学学报, 2018, (8).
- ④ 苑利.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我们所需注意的几个问题[J]. 农业考古, 2006, (6).
- ⑤ 王思明. 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及保护中应注意把握的八组关系[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2).

为“世界一大奇迹”“中国第二长城”。^①也因之以今日世界上任何遗产学说、概念、类型、“名录”相对我国的农业遗产,都难以完整纳入、囊括。换言之,中国的农业遗产不仅体量大,而且名目细。联合国的“遗产体系”原本是依照西方体裁之量身订制,具有强烈的话语倾向,这是公认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体系(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项目中除了强调与相关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之外,最为重要的是突出了景观和生物的多样性特点。^②而中国农业遗产的多样性特点,特别是其中的生态智慧值得大书特书。

若以中国农业遗产与现行联合国农业遗产分类体制相比况,同中有异。联合国的分类大致包括农业遗址、生物景观、农业器具、农业习俗、农业历史文献、名贵物产等内容。中国农业的大分类是农桑;小类则更为详细,比如民国时期毛崑、万国鼎编辑金陵大学图书馆丛刊第一种《中国农书目录汇编》全书,根据当时最新农学与旧时农书分为:总记、时令、占候、农具、水利、灾荒、名物诠释、博物、物产、作物、茶、园艺、森林、畜牧、蚕桑、水产、农产制造、农业经济、家庭经济、杂论、杂等十几个大类。^③也就是说,由于我国农业传统悠久,分类精细,以现行联合国的分类对照,实有削足适履之难;比如我国农业遗产中包含着“天文-地文-人文”为一体的认知性,就为联合国分类“名录”所限制和限定;——即如果我们要对应申报,就不得不依照分类名录进行“拆卸-组装”。我国当下的农业遗产虽然也有自己的分类,但却是以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分类为“纲”;农业部办公厅曾在 2013 年专门印发了专门的文件,^④农业遗产的“中国特色”却不鲜明。

众所周知,在当今的世界语境中,遗产同时是权力话语的表述。具体而言,今天的遗产是在当代全球化遗产事业的历史语境中所“创造的遗产”(creating the heritage)。这种“创造”,除了凸显了“发达国家”的遗产话语特征外,还凭附了大量的“次生因素”,即累叠了许多与遗产“原生因素”不相干、甚至不相容的东西。此外,遗产还经常成为各种利益群体及国家之间斡旋、协商的平衡物。同时强化了行政管理方面的重要性。^⑤这提醒我们,一方面当今的遗产事业是全球化中的产物,虽然遗产指的历史之“旧”,语义却完全呈现当代之“新”,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发明。另一方面,联合国遗产形制原本为“操作性”所羁绊,强调原则和原理,忽略个性与特色。

这提醒我们,我国的农业遗产在传承中必须注意:(1)当代农业遗产分类需与我国的农业体系相配合,而事实上,联合国粮农组织所设定的农业遗产与我国的传统的农业遗产并不完全吻合,即便是其中所强调的“农业景观”,亦难以囊括我国传统的农业中的“五生”(生态、生命、生养、生计和生业)的整体景观。^⑥(2)既然我们有自己传统的农业遗产体制与形制,就不必完全搬用外来,而要秉持自主原则,即不仅要在联合国“遗产名录”中反映中国农业遗产之“名录”需求,更要有体现农业遗产独特景观的“中国责任”。因此,我们强调“并作”,既在操作上与世界农业遗产体系相配合,同时要更加注重我国自己的农业遗产的发掘、保护与传承体系与方式。(3)对遗产主体性的充分尊重和利益分享。我们农业遗产中之“天人合一”“万物并作”是生态农业的完美呈现。当今之“行政当家”,切不可为了多一项“世界遗产”之名目,却混淆、混渎,淡化、弱化了遗产的主体性,致使“谁的遗产”成为模糊之窘况。现行的遗产运动经常出现遗产“分离-倒错”现象,遗产的主体,即遗产的创造者与实践者在主体上“失声”,而未经“授权”的

① 赵佩霞,于湛瑶.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梯田类遗产的保护研究[J].古今农业,2018,(3).

② 闵庆文,孙业红.农业遗产的概念、特点与保护要求[J].资源科学,2009,(6).

③ 高国金.民国农业文化遗产调查与保护研究[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

④ 参见《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书编写导则》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规划编写导则》的通知(农办企[2013]25号)公报。

⑤ Bazin, Claude-Marie. Industrial Heritage in the Tourism Process in France[A]. In Lanfant, M., Allcock, J. B. and Bruner, E. M. (ed.): International Tourism: Identity and Change[C].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5: 124~125.

⑥ 彭兆荣.重建中国乡土景观[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代言者越来越多,包含游客。^①

当今的全球化致使全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这一表述生动地演绎了大家都是主人而实际上没有“主人”的情状,而这恰好是遗产学研究重视而遗产保护在操作上的漠视与忽略部分。多主体性的介入,使得真正的遗产主体被“他者化”“多主体化”所异化。中国是一个农耕文明传统的国家,费孝通先生概括为“乡土中国”。^②在这样“家国天下”的背景中,“三农”(农业、农村、农民)是遗产的主体,尤其是,特定地方的人民会将这些遗产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而非其他人的。事实上,今天的“三农”已然缀入了大量非农因子和因素,这些因子和因素常常弱化了遗产的主体性;因为,真正的遗产实体最终只能由创造者和传承者(即真正的主体)承担责任,那些“冒充的主体”终究是不承担责任的。换言之,我国农业遗产属于特定地方民众的家园遗产,他们才是真正的主人和主体。

与其他遗产类型相一致,农业遗产属于一种特殊的记忆形式,也是一种特定的记忆选择。就是说,当某一个地方、某一种类型的农业活态遗产、某一个农业遗址等被确认和确定为遗产时,就意味着它被当作一个特殊物被刻意地“贮存记忆”。农业遗产不是一般记忆,而属于“选择性的历史记忆。”^③根本上说,中国的“社稷历史”就是农业遗产;它除了帮助人们追忆往昔的光荣和荣耀,强化历史的自豪感外,更是生计方式。总体上说,我国传统的农业遗产是根据自然的“节气”所形成了农耕范式;二十四节气故为中式“非遗”。同时,小农经济的持续性、“自给自足”构成了中国三农的生境实况;其中“农桑”“耕织”“男女”形成了重要的农业社会化分工与协作。所有农业遗产的道理、情理皆属入其中,迄今依然。无论当今的情势发生多大、多快的变化与变迁,对于中国,农耕文明的底色都未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农业遗产名录”正在改变传统的中国农业遗产现状。任何特定的农业遗产都有其“前景(前台)”(foreground)与“背景(后台)”(background)的整体性区别,前者倾向于指生活的实际情形(即我们现在的情形),而后者则指依照原有情形所包含的应有潜质(即我们应该的情形)。^④“前景-背景”拟构包含以下几种情形:(1)按照事物的自身逻辑所进行的自然演化、进化和变化。这种情形更多指事物在变化和变迁中没有或较少受到外界激烈的、人为的事物、事件的影响。(2)在剧烈的外部力量作用下,事物的主体因此失控而使演化方向发生改变。遗产的主体性整体失落。(3)外部力量虽然发生作用,甚至在特定的情境中这种力量的作用还很大,但事物的主体性仍然能够因势利导地掌控局势的变化。

概而言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耕文明的国家,农业为遗产之最大宗者,需要在联合国遗产事业中了解和确认自己的特点和特色。

二、水土沟洫

从农业遗产的可持续性看,水字当头。水之于人类的生存,之于农业的持续皆是攸关性的。没有水,人便无以生计;没有水,农便无以延续。古人滨水而居,为的就是便于取水;也要面对水患的危险。由于水对农业的重要性,而在远古年代,灌溉是否存在还不能确定,天雨于是成了最重要的来源,卜辞中有关下雨的占了很大比例。^⑤综观世界历史,“洪水传统”(flood tradition)^⑥大抵为肇端。这表明水作为人类至关重要的生命和生活需求性功能和工具,“利害”是人类亘古的认知和实践。作为历史的教

① 屈册,张朝枝.谁的遗产——元阳梯田旅游经营者遗产认同比较[J].热带地理,2016,(4).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③ Harrison,D.& Hitchcock,M.(ed.) The Politics of World Heritage[M].Clevedon/Buffalo/Toronto: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2005;6.

④ Hirsch,E.and M.O'Hanlon(ed.) The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Perspectives on Place and Space[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3.

⑤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8(2008);523~524.

⑥ Byron C.Nelson The Deluge Story In Stone——A History of the flood theory of Geology[M].Minneapolis: The Division of Bethang Fellowship, Inc.1968;170~190.

训,洪水以两种方式惩罚人类:一种是洪水(大水),另一种是干旱(缺水)。这也真切地反映在农业生产上的实情和实景。中国古代文明由水而起,《尚书》之“洪范”“禹贡”等篇都讲述了古代洪水和大禹治水的“中邦-九州”的故事。在这里“水土”与“九州”成为创世神话中的因果关联。而农耕文明也会在农业中嵌入与水有关的生态智慧。

“水”之于文明的重要性,当然包括了“水”在农业遗产中是一个纽带式的“链条”,洪水退却,耕地露出水面,成为可以耕作的土地;而大禹治水,水之道也,这样“导”与“道”相互关联,都是自然之道。^① 比如在成都平原,“天府良田”与“都江堰”水利之间的榜样关系可以为范。事实上,在农业范畴,水土是农史上应对的最基本主题,即水土保持之涝-旱问题。因此,“水利”的主题直至为重要。德国人魏特夫的著述《东方专制主义》,即以“东方水利社会”来解释东方社会的专制与控制,即以控制水来控制社会,水与专制制度是一个互为关联的生成模式。^② 虽然学界对魏氏的“水利专制”的理论质疑声不断,却不妨碍其成为历史上有关农业-水利-专制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历史“原点”。

我国的农耕文明,由于地理环境的多样,从世界范围看,人类最具代表性的主食是麦子和稻子。我国的反映也非常真切,即传统的农耕文明主要以北方麦作与南方稻作为代表。由于与水源发生密切关系,故通常以河流命名,“黄河-长江”即为代表。考古材料证明,小麦、大麦为外来作物,古代谷物从“禾”旁,唯“麦”从“来”旁,说明其为外来。^③ 小麦在大约 10000 年前从一种野草在中东被人工培植化,然后传遍了全世界。^④ 大约 4000 年前,小麦从西亚传入了中国,并在中原腹地推广。因为小麦产量是粟的数倍,小麦逐渐替代粟成为整个中国北方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⑤ 稻作文明则起源于我国,起源地为长江中下游地区。2019 年浙江良渚古城遗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为世界展现了 5000 年前中国的稻作文化。“稻”作为粮食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稻在五谷之外,稻列五谷之中,稻成五谷之首。^⑥ 至于黄河流域的麦作和长江流域的稻作,在新石器时代,似乎就有界限了。^⑦ 这也反映了中华文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历史认知与评价。

归根结底,“水土保育”成为农业伦理中的重要范畴。今天,我们了解到水利遗产之于农业的重要性时,便能明白水利灌溉的生态关系,以及对于整个文明体系和技术系统的重要性。而水利工程的原生形态,或曰雏形,即所谓的“沟洫形制”,这无疑为中华民族农业文明中生态智慧的典范,也是“井田制”之古代理想农业样本。古代的文献中记录了农耕文明中“水(利)-土(地)”之间的协作关系。《周礼·地官·遂人》记载:

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

这其实是一个极为生动的古代农业景观,其中讲述了两个互为相连的系统,一是农田系统,一是灌溉系统。农田以“夫”为基本单位,一夫受田百亩,夫田与夫田之间有称为“遂”的水渠,遂上有称为“径”的田路。每十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沟”的水渠,沟上有称为“畛”的道路。每百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洫”的水渠,洫上有称为“涂”的道路。每千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浍”的水渠,浍上有称为“道”的道路。每万夫之田之间,有称为“川”的水渠,川上有称为“路”的道路。如此通达于王畿。而田野中的沟洫、道路系统有严格的丈尺规定。据郑玄注,遂,宽、深各二尺;沟,宽、深各四尺;洫,宽、深各八尺;浍,宽二寻、深二仞。^⑧

① 濮德培.万物并作:中西方环境史的起源与展望[M].韩昭庆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18:52,55.

② 卡儿·魏特夫(K.Wittfogel).东方专制主义[M].徐式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③ 李根蟠.中国古代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8.

④ 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M].林俊宏译.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17:77.

⑤ 庞乾林,等.稻文化的再思考 I:无粮不稳之稻与社稷[J].中国稻米,2013,(3).

⑥ 庞乾林,等.稻文化的再思考 I:无粮不稳之稻与社稷[J].中国稻米,2013,(3).

⑦ 李济.中国早期文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101.

⑧ 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M].北京:中华书局,2013:73~75.

虽然我们相信,在现实中很难如此完美绝对,但却是中国农业整体形制的样本;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农田乃至农业的规划,同时也是国家行政治理体制的根据。我们不妨将这样的农业规划蓝图概括为中国农业的“水土智慧”。

沟洫的农业形制曾经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农业“水利”的雏形。后来发生了变化,所谓“井田废,沟洫堙,水利所以作也。本起于魏李悝。”^①在古代农业,“水利”只是指农田灌溉,与今日的防范洪涝灾害、航运等综合体不同。原始社会后期,当黄河流域先民从高地迁移到低平地区发展时,面对的是遍地的沮洳和流潦,对农业生产最大的威胁是洪涝而不是干旱。为了把洼地改造成农田,需要修建农田沟洫,造成长垄式的畎亩农田。修建农田沟洫成为水土整治工作的重要环节。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既要疏通河道,“决九川距四海”,又要修建农田沟洫,“浚畎洫距川”。^②

于是,沟洫形制与井田制便历史性地发生关系。所谓井田制,从外在形制看,是被纵横交错的沟洫划分成井字形的农田;从内核看,是基于修建农田沟洫系统的公共职能的村社土地公有私耕制。所以农田沟洫系统与井田制联系在一起。耕地主要集中在各自孤立的城邑周围,而且沟洫道路又占去了农田区中的大量土地。稍远一点就是可以充作牧场的荒野。春秋中期,尤其是战国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素有三:一是铁器在黄河流域的逐步普及大大加强了人们开发农田、改造自然的力量。二是人口繁衍、需求增长使拓展农田、突破斑点式开发的格局成为必要和必然。三是经过长时期的整治,农田区中涝洼渍水的状态已经有了很大改变,沟洫道路大量占地已不复合理。原来的沟洫道路被辟为农田和村落,史称“李悝以沟洫为墟,自谓过于周公”,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从此低畦农田逐渐代替了畎亩农田,阡陌逐渐代替了原来与沟洫配套的道路。与沟洫井田系统废弃同时发生的,是“水利”的兴起。^③

概而言之,农业与水之间构成了一体性概念,人们可以从人类历史上的古代农业文明大多以河流命名这一“历史事实”中瞥见之。

三、造化梯田

水之于农作物的关系制约性的,“水田”无论是泛指农作物(包括旱地作物)的耕作田地,还是特指种植水稻的耕地,“水”与“田”皆互为言说。^④二者的关系也是今天我们评价农业是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对于生态农业来说,水土与生态之间不仅保持着友好关系,而且在这种友好关系中贯彻着自然原则和生态智慧,我国南方的梯田不啻为典型,代表性的样板为广西龙胜龙脊梯田、福建尤溪联合梯田、江西崇义客家梯田、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云南红河哈尼梯田等;这些梯田以“中国南方稻作系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红河哈尼梯田的评介时指出:“在过去的1300年里,哈尼人发展出复杂的沟渠网络,保证山顶森林里的水源可以流向梯田。他们同时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农耕文明,牛、鸭、鱼、泥鳅等可以帮助红米这一梯田主要农作物的生长。梯田的居民崇拜太阳、月亮、山脉、河流、森林以及包括火在内的其他自然现象……正是基于特殊的、源远流长的社会宗教结构之上,这一极具弹塑性的梯田土地管理系统在视觉和生态上都充分说明了这里的人们与其自然环境间非凡的和谐关系。”^⑤尤其值得宣扬的是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层层叠叠交错在哀牢山中,这种梯田制造化成了生态的一种样榜。^⑥将人的生命、生养、生计、生业融入生态之中。而梯田作为遗产,只是我国农业遗产之一范,还有大量遗产类型,值得予以特别关注。

中国是一个多种自然生态相融合的国家,因此,农耕文明中包含着大量梯田耕作的山地生态智慧。

① 参见宋高承.事物纪原[M].卷1“水利”引《沿革》。

② 参见《尚书·益稷》注:“距,至也。”《论语·泰伯章》述,禹治水时曾“尽力乎沟洫”。

③ 李根蟠.“古今中外法”与农业遗产研究杂谈[J].农史研究,2013,(1).

④ 曾雄生.中国稻史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8:23.

⑤ cultural landscape of Honghe Hani Rice Terrace[EB/OL].<http://whc.unesco.org/en/list/1-22/2016-09-07>.

⑥ 王清华.梯田文化论——哈尼族生态农业[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1.

《诗经》中就有“瞻彼阪田,有苑其特”的诗句,“阪田”系指山坡地上的田。它的出现早于写作该诗的西周幽王六年前后,即早于公元前 776 年,表明在大约 3000 年前就有了在坡地上种植的“阪田”,它是梯田的雏形。有的学者认为,《尚书·禹贡》中的“厥土青黎,厥田上下”中的“厥田”指的是梯田,是中国史籍对梯田最早的文字记载。^① 汉代时出现了“区田”,虽非专指坡地田垄,却包括其中;《汜胜之书》在对区田的论述时说:“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须良田也。诸山陵近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皆可区田。”有学者考据,我国的梯田是根据“阪田”的经验,把山坡田改造成为水平的梯田。梯田的修筑方法是沿着山的坡度,按等高线筑成堤埂,埂内开成农田,上下连接,像阶梯一样。梯田可能至迟在五代时期出现,“梯田”之名最早见于南宋范成大的《骞鸾录》,他根据自己在南方农村的旅行见闻,写下了“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②“梯田”显然是一个象形概念,因其形貌如阶梯故名之;梯田所包含的生态智慧却与地理形态相协,是因地制宜的农业生产形态。

中国是一个多山地形态的国家,如何在山坡上种植粮食,特别是南方的水稻,水土保持和保护无疑是梯田形制中最重要的技术。王祯《农书》中专列梯田条,并对其构筑、垦殖以及对梯田独特的空间格局和耕作方式有形象的描述:

梯田,谓梯山为田也。夫山多地少之处,除垒石峭壁例同不毛,其余所在土山,下至横麓,上至危巅,一体之间,裁作重蹬,即可种艺。如土石相半,则必叠石相次,包土成田。又有山势峻极,不可展足,播殖之际,人则讴螭蚁沿而上,褥土而种,跟坎而耘。此山田不等,自下登涉,俱若梯蹬,故总曰‘梯田’。上有水塘,则可种粳林,如止陆种,亦宜粟麦。^③

由于我国南方的山岭地区不少为少数民族栖息和生活的地方,所以我国南方的梯田也包含着不同少数民族的文化多样性和生态智慧的呈现与表达。另一方面,梯田劳作当然也比平土作业更为艰辛,民国刘锡蕃对此有过描述:

蛮人即于森林茂密山溪沕流之处,垦辟为田。故其田畴,自山麓以至山腰,层层叠累而上,成为细长之阶级形。田塍之高度,几于城垣相若,蜿蜒屈曲,依山萦绕如线,而烟云时常护之。农人叱犊云间,相距咫尺,几莫知其所在。汉人以其形似楼梯,故以“梯田”名之。此等“梯田”,其开垦所需工程,甚为浩大。其地山高水冷,只宜糯谷。春耕既届,蛮人即开始工作,其犁田,不用牛,以锄翻土,纯任人力为之。在农业史进化之程序上,最初原用锹锄,其后乃用犁,今蛮人犹固守最苦之锄耕形式,一方固因其顽固不化;一方亦由其田面太小。不适于牛之旋转也。邻黔诸蛮,间亦采用“偶耕”方式,即以二人负犁平行,代牛而耕,一人执犁以随其后,其艰苦尤不可言!^④

水系对于水稻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哈尼梯田用水并不主要来自降雨,水系的自然循环使哈尼梯田成为一个天然水库。哈尼人把森林视为哈尼梯田的保护神,将林木细分为神树林、村寨林、水源林,不允许破坏这些树林,一旦有人违规,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当低海拔的江河之水经高温蒸发变为云雾上升到高山区,然后凝聚为雨水降落在原始森林中形成溪泉瀑布和地下潜流,这些水源被山腰挖掘的沟渠悉数截住,据统计,哈尼梯田骨干沟渠就有 4653 条之多,长达数十公里。^⑤ 哈尼梯田的保护是两个体系共同作用的结果。森林与水系的关系是关联性的,没有森林,水土便保不住。当地人对树木和森林的崇拜,有效地保护了森林资源。水田中还进行“稻鱼共生”模式。

梯田农业的发展更突出了森林的作用。为了村寨的安宁和梯田的发展,哈尼人对森林进行划分和

① 王清华.梯田文化论——哈尼族生态农业[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1.

② 惠富平.中国传统农业生态文化[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142;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72.

③ 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田制门[M].北京:中华书局,1991:142.

④ 刘锡蕃.岭表纪蛮[A].亚洲民族考古丛刊(第五辑)[C].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87:122.

⑤ 童潜明.我国古代三大梯田的共性以及紫鹊界梯田的特有性[J].山川地理,2006,(4).

保护。哈尼梯田地处哀牢山地带,山高谷深、沟壑纵横,水汽循环自然形成。这也是梯田所形成的特有地理景象。不同层次的林木的作用不同,当地最高的山林称为总管神林,周围山林称为分管神林,另还有水源神林、村寨神林以及护家神树等,人们对于这些神林要定期进行祭祀。护寨神林保护与祭祀就是生动的例子:在所有哈尼族村寨后都有一片神树林,每年的“昂玛突”(祭寨神)都会如期举行。全村人在“摩匹”(仪式主持者)“咪谷”(村寨长老)的率领下,来神树林中虔诚地跪拜,祭祀“神树林”,并在村中摆出“长街宴”与神同乐。哈尼人认为,森林就是父母,就是上天,就是至高无上的神。^①而哈尼梯田被评选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主要优势,正是其精密的农林业和水分配体系,以及与环境互动模式。^②

笔者在哈尼梯田田野调查时,专家和当地的民众告诉笔者,哈尼梯田本是一个水土与水汽的生态循环体系,这种循环体系是当地自然形势与地理形态生成而成。元阳县土地全为山地,无一平川,最低海拔144米,最高海拔2939.6米,相对高差2795.6米,年平均气温24.4℃;年降雨量最高1189.1毫米、最低665.7毫米、平均899.5毫米。常年云雾缭绕,水汽充沛,闷热气候使得低处的河谷水汽蒸发升腾,随着坡度的升高,温度逐渐降低,化作水雾飘在空中,为林木与土地所授。而山上的森林又将水渗入土地而排下,构成了一个哈尼梯田体系生态智慧的完美形态,这种情形颇似菲律宾科迪勒拉高山水稻梯田“水源涵养林-木涌^③-聚落-梯田水系”,是一个完整的生态构造。^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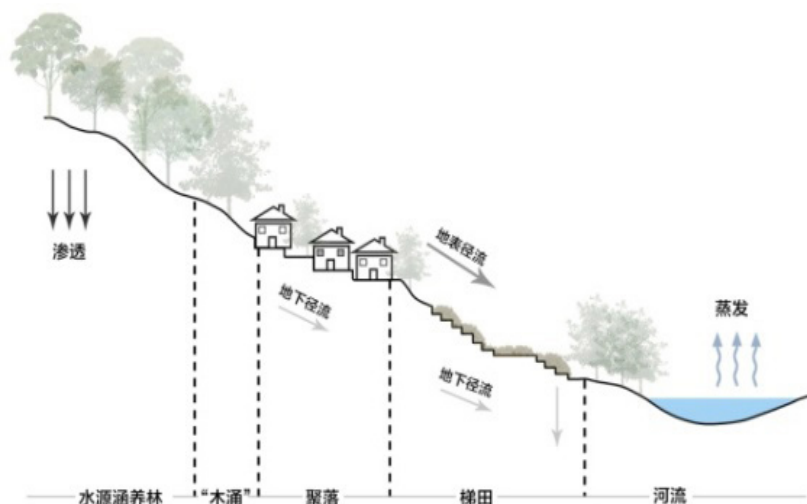


图1 水源涵养林-木涌-聚落-梯田水系(姜丽依原图绘制)

作为农业遗产,梯田的生态模式决定了今天对它的保护方式:(1)尊重遗产的主体性,其中自然和人文的主体性应首先要考虑。任何行政部门、工程项目、大众游客等尤其应该遵守。(2)梯田既是原生态的,又是活态,前者强调其不可迁移性,因此必须持原址原地保护的原则;^⑤后者突出其根据自然所形成了地方性特色,因此必须坚守持续性的传承原则。(3)作为农业遗产,我国南方的梯田中不少属于不同民族、族群的创造性产物,其中包含着大量民族、族群的风俗、民俗,是他们的家园遗产,他们是“主人”,任何“客人”都要尊重那些地方风俗。(4)南方的稻作文明不仅成为农业生态的遗产,历史上的“稻作东

① 王清华.红河哈尼梯田生态及景观的现代修复[J].思想战线,2016,(2).

② 葛兴燕.哈尼梯田与龙脊梯田的形成利用探讨[J].现代农业科技,2015,(6).

③ “木涌”(Muyong),指森林与梯田的缓冲区。参见侯惠琚,等.基于生态恢复和文化回归的梯田景观格局重建——以菲律宾科迪勒拉高山水稻梯田景观复兴为例[J].生态学报,2016,(1).

④ 侯惠琚,等.基于生态恢复和文化回归的梯田景观格局重建——以菲律宾科迪勒拉高山水稻梯田景观复兴为例[J].生态学报,2016,(1).

⑤ 徐义强,李凯冬.农业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保护与开发刍议[J].农业考古,2013,(1).

传”无异于一种特殊的“线路遗产”,其中除了在中国境内的传播外,主要指东传日本。^①而在联合国农业遗产的分类中,还鲜见农业的线路遗产。^②

概而言之,1994 年联合国公布线路遗产,^③中国作为世界农业遗产的典范,在稻作文明方面,中国是公认世界上最早诞生地,而梯田正是特殊生态环境中的范本。

结 语

中国的农业文明举世公认;传统农业遗产为中华民族最大宗的遗产。从天时地利人和的宇宙观,历代以农为本的农政传统,自然生态的农业智慧,农桑一体的社会构造,村落风水的家园遗产,中国式城乡关系形制,耕读传家的知识生产体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机制,农工协同的务实性发展形态,乡土社会的礼教性宗法伦理,多元多样的农业生成原理,南北农作(稻作、麦作)的框架性分制,农田水利的人文生态协作关系,农业知识的传承与传播途径,到农业文献(农书)的卷帙浩繁等等,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研究拓展空间,即便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全球重要农业遗产体系亦难以囊括。今天,我国正在实行乡村振兴战略,这也是一项“传统的创新”行动,嘱我辈竭力承之,努力为之。

On the Ecological Wisdom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Perspective of Terraced Fields

PENG Zhao-rong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Artistic Heritage,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Chengdu 401331, China;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Chinese agriculture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ecological wisdom. The contemporary items or lists of “key agricultural heritages of the world” cannot fully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emphasize both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This paper gives a case study of terraced fields, and analyzes the multi-value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heritage. Terraced fields are an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in south China and reflect the wholeness and subjectivity of the ecological train, in which “water and soil” plays a key role while “water” serves not only for irrigation but also for politics like the role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heritage.

Key words: agricultural heritage; terraced fields; water and soil; gully

[责任编辑: 黄龙光]

① 彭世奖. 中国农业历史与文献研究[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6: 259.

② 彭兆荣. 线路遗产简谱与“一带一路”战略[J]. 人文杂志, 2015, (8).

③ Report on the Expert Meeting on Routes as a Part of our Cultural Heritage (Madrid, Spain, November 1994)[EB/OL]. <http://whc.unesco.org/archive/routes94.htm#annex3>.